

樽查考辨

刘芳芳

(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)

内容提要:文献中,樽与奩这两种器物常常被混淆。“奩”是主要用来存放与梳妆相关的器物,战国时为单层,汉代的时候出现双层奩同时流行多子奩。奩以圆形为主,带盖,常集彩绘、嵌扣、贴金银箔等多种工艺为一体。“樽”则为战国时期出现的日常实用酒器,分盆形和筒形两大类,胎骨多为铜胎或木胎,分为有盖和无盖,底下常有三足。

关键词:樽 奩 考辨

中图分类号:K875.2

文献标识码:A

笔者在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奁时，发现“樽”与“奁”这两种器物在命名上有些混乱：“奁”一般不会被误认为“樽”；而“樽”，尤其是带盖的筒形樽却常常被误称为“奁”或“三足奁”。如1985年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出土的一件器物（器物号K1:3），简报命名为“奁”，其实这件器物应该称为“樽”。本文就这两种器物的形制、特征和用途试作探讨，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，不足之处恳请方家赐教。

“奩”字最早见于《说文解字·竹部》：“奩，镜奩也。从竹，斂声。”奩也称为“检”。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简一四中有“镜一，有检”，指的就是一件针刻纹漆奩^[1]。因奩中经常放置铜镜，故奩也被称作“镜奩”。《后汉书·光烈阴皇后纪》载：“（明）帝从席前伏御床，视太后镜奩中物，感动悲涕，令易脂泽装具。”李贤注曰：“奩，镜匣也，音廉。”^[2]

从《说文解字》的释义以及凤凰牌中不难看出,“奩”最初是指一种竹木的小型容器。这类容器除少数存放食物、帛书外,主要用来存放与梳妆相关的器物,如镜、梳、篦及面部化妆品。漆奩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并流行开来,汉代漆奩在楚式漆奩的基础上,传承与开拓并举,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关于

奩的演变,笔者另文叙述,此不赘言。

奩一般比较低矮,以圆形居多,其次为椭圆形和长方形,偶见正方形。直壁,底多平底,由盖和器身扣合而成,器盖与器身的扣合方式可分为直口和子母口两种。战国楚地漆奩都比较扁矮。例如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两件奩:一件为直口奩,器盖套合至器身底,直径26.4、通高14厘米;另一件人物故事纹漆奩,子母口,直径27.9、通高10.8厘米(图一)^[3]。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漆奩,盖与身子母口套合,盖径13.1、盖高6、底高6.1、径12.75、盖合后通高7.9厘米^[4]。汉初的单层奩一般也较扁矮。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一件针刻纹奩(168:123),盖径17.7、通高11厘米,盖与器身相套合^[5]。1998年在安徽无为县甘露村发掘了4座古墓,墓葬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的M2中出土的一件漆奩。布脱胎^[6],圆筒状,直壁,平底。盖顶微隆,盖套于器身的外部,盖径26.5、高8厘米,奩身直径26.1、高9厘米^[7]。2001年,安徽六安市九里沟发掘了两座西

汉早期的墓葬。编号为M177:35的圆奩,木胎,平顶盖,盖与器身直口套合^[8]。从简报中此奩的线图来看,套合后,奩的盖壁的下沿接近了奩身的底部。从上述数例可以看出,漆奩盖的侧壁与器身的扣合比例占整体高度的比例较大,扣合后,盖的侧壁要占整个器高的一半以上。



图一// 人物故事纹漆奁

收稿日期 2011-04-12

作者简介 刘芳芳(1979~),女,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,主要研究方向:战国秦汉考古。

与甗有共同之处。王振铎先生则把这类器物直接定名为“樽”,认为是酒器^[22]。1962年山西右玉县出土了三件西汉铜樽,其中两件形制相同^[23]。这两件相同的樽为圆筒形,有盖,平底三足。盖顶中央有提环,周围有三个凤形钮,腹两侧各有一个衔环铺首,底接三个熊形足。中腹部一周宽弦纹带将腹隔为上下两区,酒樽外壁装饰着生动的浮雕兽面人

身纹,以及虎、牛、羊、猴、龙、凤、鹿、骆驼等十余种动物纹样。盖内还残存有彩绘鸟兽纹,上面有一层朱漆。两器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均刻有隶书铭文:“中陵胡傅铜温酒樽,重廿四斤,河平三年造。”^[24]这件自名为“温酒樽”的器物,通高25、口径23、壁厚0.4厘米(图二)。同时出土了另一件铜酒樽,通高34.5、口径64.5厘米,平唇、鼓腹、圜底,下有三虎形足,腹有素宽带,中加弦纹一道。与带纹平行,分列三个铺首衔环,通体鎏金,并加彩绘群兽。画法是用纤细的墨线双勾,再填白、红、黑等色。平唇上刻铭文:“剧阳阴城胡傅铜酒樽,重百廿斤,河平三年造。”(图三)带盖,筒状的称为“温酒樽”,容量较小;而不带盖的盆状器称“酒樽”,容量较大。

唐兰先生说:“温就是‘醕’字……醕酒是反复重酿多次的酒。”^[25]孙机先生也认为“温”和“醕”两字通假。“温酒樽”是盛酒用的,并非温器。醕酒为多次重酿之美酒,其色清澄,故亦称“清酒”,而其盛器筒形酒樽亦称“清樽”^[26]。因而盛醕酒的筒状尊要比盛一般酒的盆形尊级别要高些。筒形尊上置盖,既卫生又保美酒醇香,并附有圆形三足托盘;而盆形尊则往往与他器杂置在案上或地上,并无专用的承旋,规格显然要低一些。饮宴时,不同的樽盛放不同的酒,正如汉乐府《陇西行》中所描述的:“清白各异樽,酒上正华疏。”^[27]由于酒樽高雅,常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句中,李白有“金樽清酒斗十千,玉盘珍馐直万钱”之句^[28]。1972年河北省邯郸市张庄桥发掘了两座砖拱多室墓,M1和M2至少各随葬一套酒樽^[29]。在M1中出土了一件带刻铭的铜酒樽托盘和一件铜酒樽盖,在M2中出土了一件鎏金银铜酒樽(缺盖)。



图二// 铜温酒樽

酒樽为平底圆筒形,腹部两侧透雕蟠龙衔环铺首,三熊形足。外壁三周素面宽带纹,间饰花纹带两周:上面一周绘流云、飞鸟、怪兽、羽人、西王母及左右侍神仙;下面一周绘流云、禽兽等图案。樽口径35、高28.2厘米。樽盖隆起,三鸟形钮,中间提环残缺,盖面上绘流云纹两周。承盘为宽平沿,浅直壁,大平底,下置三熊形足。器物通体涂金,花纹地鎏银,熊形足上镶嵌水晶、绿松石等,装饰华丽,工艺精湛。盘口径47.5、通高8.5厘米。托盘沿下刻有隶书铭文:“建武廿三年,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。内者室,铜工堂,金银涂章,文公循,造工茱。护工卒史恽,长汜,守丞汎,掾习,令史愔主。”^[30]这件公元47年出自蜀郡西工的乘舆大爵酒樽,出现在汉代邯郸贵族墓葬区,是朝廷赏赐之物,还是其他由来,还有待进一步研究。其铭文不是刻在樽上面,而是刻在托盘上,可见,这件托盘当时是和樽配套使用的。

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蜀郡西工造鎏金铜酒樽,下承盘。樽,圆筒形,通体鎏金。樽腹中腰饰凸弦纹三道并附对称兽面衔环,三熊状立足,通高41、径35.3厘米。承盘较浅,也有三熊状足,径57.5厘米。樽和托盘的熊形的足上镶嵌绿松石和水晶,制作精致(图四)。盘上刻有铭文:“建武廿一年,蜀

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,雕蹲熊足,青碧闵瑰饰,铜承旋径二尺二寸。铜涂工崇、雕工业、冻工康、造工业造。护工卒史恽、长汜、丞萌、掾巡、令史郎主。”^[31]可见,这种与酒樽配套的托盘当时称为“承旋”。南昌市京家山汉墓中出土类似配有承旋的樽^[32]。樽为圆筒形,博山炉式盖。樽直口,直腹,平底。盖上作层峦叠嶂,有人兽出没,中央山峰立一大鸟。这种樽盖的出现可能是受两汉流行的博山炉的影响。两侧壁中部各有一衔环铺首。腹部以凸弦纹隔成上下两栏,分别刻有仙人、瑞兽和飞禽。口径23.5、高16.7、通高30厘米。承旋破损,盘口平弧外撇,浅腹,平底。下有三熊足。承旋底心为四出柿蒂纹,周围刻有多道纹饰,盘径39.5、高6.8厘米。

樽始于战国,庄子《逍遥游》中



图三// 山西右玉县出土
铜酒樽口部铭文



图四// 建武廿一年铭镀金铜酒樽



图五// 错金银龙纹带盖铜樽



图六// 铜温酒樽

有：“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又有“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”^[33]。江陵望山2号墓曾出土一件错金银龙纹带盖铜樽(图五)。盖为斜直壁平顶，盖沿垂足并内折成子口以套合于器口内，盖边有四个鸟形环纽。腹为圆筒形，上大下小，腹上部有两个铺首衔环，平底，下有三个兽面矮蹄足^[34]。此器上有为数众多的龙凤纹图案，反映了楚国青铜器花纹技艺的精湛。通高17.1、口径24.7厘米。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两件铜樽。弧盖平顶，中部有相背对称衔环铺首。通身饰金银图案，饰多组龙纹。内髹红漆。标本2:167，出土时内盛有动物骨骼。口径24.8、通高17.5厘米^[35]。樽可能除了用于盛酒外，也用于盛食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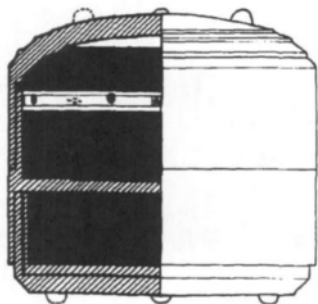
汉代，铜樽在上流社会是常见的酒器。我国南方地区如广西、贵州、广州等都有出土。广西贵港市深钉岭汉墓出土两套附承旋的酒樽。其中一件(M1:10)全身刻满花纹，象首状扁足，直口，直腹，平底，盖作凤鸟纽博山圆锥状。口径18、通高25.6厘米(图六)。另一件M12:26，无纹饰图案，兽状扁足。子母口，直腹平底。腹两侧有衔环铺首。盖上有桥形纽，内套一环，盖顶等距离分布三只羊。口径约20、通高21.5厘米。樽内出有火烧痕的断柄木勺^[36]。樽的胎骨除铜胎外，还有木胎、布脱胎、陶胎等。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一漆樽，木胎，内髹红漆，外髹黑漆，无纹。器型扁矮，敞口，盖顶微隆起，中部有一铜套环，斜直壁，腹部有两个对称的铜铺首衔环，平底，三个铜蹄足较矮^[37]。满城刘胜墓中出土一件樽，器身已朽。盖顶有铜质钮，钮座银质，镂刻柿蒂形及动物花纹；盖缘及器身上下饰银扣。腹部有银质镂空花纹带一周，有对称兽面衔环铺首，三蹲熊足。樽为布脱胎。樽上有铭文：“御褚□尊一，卅七年十月，赵献。”^[38]洛阳烧沟汉墓中出土了许多陶樽^[39]。有的里面有勺，有的有兽骨。第一型陶樽火候比较低，有三足。有的无铺首，有的筒腹中腰对称施二模印的铺首，这类陶樽应为明

器。

从考古资料来看，樽常与勺、耳杯同出。如江苏邗江胡场M1出土漆樽，木胎，圆筒形，直口，腹部两侧有衔环铺首，平底，下有三兽蹄形足。器内红色，器表酱红色。有盖的一件，通高21.5、口径23厘米，盖呈球面形，顶嵌柿蒂形铜饰。盖与器身都有多道纹饰带，为漆奁上常见的流云纹、几何纹和各种生动的鸟兽。无盖的一件，通高19、口径23厘米，内置一件漆勺^[40]。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侍其繇墓出土一件漆樽内放置7件漆杯^[41]。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还形象地展示了樽的使用场景，如甘肃嘉峪关东汉墓中的画像砖上有一件三足酒樽，下有三足承旋，樽内置一长勺^[42]。河南密县打虎亭M1的石刻画像中，其中一人正用勺从樽中舀酒^[43]。山东沂南汉画像中也发现樽多置于三足承旋之上，内置有勺，时常出现在宾主宴席间^[44]。成都市郊一宴乐图画像石(图七)，所刻画场面正如张衡《西京赋》所描述的“振朱屣于盘樽，奋长袖之飒飏”^[45]，在此画像的中间有两几、一酒樽、一孟。樽，平底、有三足，内置勺^[46]。



图七// 宴乐图



图八// 双层漆奁

三

樽为盛酒器,而奁为盛妆器,这两类器物因用途不同,形制有很大的区别。从胎骨来看,樽内部盛放的酒有一定的重量,会对樽底造成一定的压力,因此常见的酒樽是铜胎的。奁用来盛放日常梳妆用具,使用人群多为女性,以轻便为宜,其胎质多为木胎与布脱胎,不见纯铜胎。从附件来看,酒樽由于比较重,为方便提携,故需要在器身上装上铺首。器底下面接三足,可能是来自于商周时期青铜容器常皆三足的传统做法。奁由于比较轻便,一般无铺首与三足。从盖来看,樽分为有盖与无盖两种,而奁都是带盖的。为了方便开启,有盖的樽,其盖多作平缘形。盖顶附有立纽或环纽,盖沿垂足并内折成子口以套合于器口内。奁盖分为直口和子母口两种:直口奁是器盖套合至器身外部;而子母口奁,一般是器身口沿内折,上承器盖,器盖垂直的边缘较宽。从高度来看,有盖樽由于是盛酒器,其高度相对奁来说要高些。有盖樽一般为圆筒形,通高在25厘米左右,器高大于器身直径。奁多为扁矮形,圆奁的高度不超过盖的直径,长方形(包括方形)奁的高度小于其最长的边,椭圆形奁的高度也小于其长径。单层奁通高一般在10厘米左右,双层奁的高度在20厘米左右。最后,从出土实物来看,樽内常伴出勺、杯,而奁内一般都是镜、梳、篦、脂粉等梳妆用品。

古代器物在设计技术方面常常互相借鉴,常出现异器同构的现象。西汉中期以后,嵌金属扣的漆奁多有出土,而战国与汉初极其少见,笔者臆猜,这种扣带是借鉴于铜樽上常见的宽弦纹,正如有些樽盖借鉴了博山炉的造型。樽上常见的盖顶环纽在满城窦绾墓出土的五子奁(2:4113)的两个子奁上附有银质环纽和柿蒂形钮座^[47]。樽下接三足的做法,在荆州高台秦汉墓中出土的漆奁上也能看到,只不过奁的三足极其矮小,不同于樽的立足(图八)^[48]。樽与奁都为人们日常生活器具,纹饰

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,西汉以后,其装饰更多的是以朴素、贴近生活的题材为主,如弦纹、柿蒂纹、动物纹,以及体现人们求仙、企盼长生与富贵的神仙瑞兽纹等,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(文章成稿的过程中,得到了张学锋师的悉心指导,特此表示感谢!)

[1]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:《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75年第9期。

[2]宋·范晔撰、唐·李贤等注: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5年,第407页。

[3]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:《包山楚墓》,文物出版社1991年,第144页;图片采自《中国美术全集·工艺美术编8·漆器》,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,第25页。

[4]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:《江陵马山一号楚墓》,文物出版社1985年,第79~80页。

[5]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》,《考古学报》1993年第4期。

[6]据洪石在其专著《洪石:战国秦汉漆器研究》,文物出版社2006年)中认为关于漆器的发掘简报和研究文章中,凡言夹纻胎者其实皆为纻胎即布胎。这种胎骨是没有木芯的。笔者基本同意洪石的观点,但是考虑到突出这种胎骨是没有木芯,要经过“脱胎”这一工序,认为把这种胎骨称为“布脱胎”比较妥当。本文所使用的原始资料已根据实际情况将这些概念转换过来。

[7]无为县文物管理所:《安徽无为县甘露村西汉墓的清理》,《考古》2005年第5期。

[8]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六安市文物管理处:《安徽六安市九里沟两座西汉墓》,《考古》2002年第2期。

[9]湖南省博物馆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: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》,文物出版社1973年,第88页。

[10]东汉邓太后于元兴元年(105年)“悉斥卖上林鹰犬,其蜀汉扣器、九带佩刀,并不复调”。见南朝宋·范晔撰、唐·李贤注:《后汉书·皇后纪·和熹邓皇后》,中华书局1965年,第422页。

[11]汉·班固:《汉书·贡禹传》,中华书局1962年,第3070~3071页。

[12]王仲殊:《汉代考古学概说》,中华书局1984年,第48、62页。

[13]张震泽:《扬雄集校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,第28页。

[14]贵州省博物馆:《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》,《考古学报》1959年第1期。

[15][19]马承源:《中国青铜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,第198、303页。

[16]孙机、杨泓:《文物丛谈》,文物出版社1991年,第74页。

[17]宋·吕大临、赵九成撰:《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》,中华书局1987年,183~184页。见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

